

# 杭 州

姚伟钧 雷学华 马晓京 田野

地质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序言 .....	5
上篇 千年沧桑人间天堂.....	6
悠悠钱唐事.....	6
川泽沃衍商贾湊.....	7
咽喉吴越，雄视江南.....	8
吴越国首府.....	9
钱镠崛起创雄藩.....	9
知我罪我以此城.....	10
钱王射潮筑石塘.....	11
兴水之利.....	12
有国百年，吾愿足矣.....	12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13
赵氏偏安钱塘.....	15
权都吴会.....	15
“仅蔽风雨足矣。”.....	17
学宫与瓦肆.....	21
“高宗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	22
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	25
人民做主，名胜重光.....	28
下篇 人杰地灵，雅趣横生.....	29
西湖梦寻.....	29
天上掉下来的明珠.....	29
柳浪闻莺话旧园.....	30
西泠桥畔忆小小.....	31
梅妻鹤子林和靖.....	32
白堤与白居易.....	34
苏东坡浚湖筑苏堤.....	35
白娘子许仙断桥会.....	37
泉水叮咚.....	38
天下第三泉.....	38
玉泉鱼乐园.....	39
万古蛟龙潭.....	41
泉冷自何时.....	42
怀贤六一泉.....	43

送客过虎溪.....	43
九溪十八涧.....	45
青山有幸埋忠骨.....	46
岳飞墓前吊忠烈.....	46
震世英风伴鄂王.....	47
于谦魂归三台山.....	48
南屏山下添新坟.....	49
鉴湖女侠千古.....	49
壮士长眠南天竺.....	51
生不相逢死相邻.....	53
奇峰怪石古洞.....	54
感花岩.....	54
三生石上订奇缘.....	55
秦始皇缆船大佛头.....	56
吴山第一峰.....	56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57
宝石雨济贫救难.....	58
飞来峰与呼猿洞.....	59
南山第一洞天.....	61
山中水乐鸣.....	61
江南佛国.....	62
香云绕地灵隐寺.....	62
济公装疯净慈寺.....	64
天竺三寺真佛国.....	67
葛岭道观抱朴庐.....	68
伊斯兰教凤凰寺.....	70
雷峰如老纳.....	71
保俶如美人.....	71
孤塔凌霄汉.....	72
神工鬼斧石造像.....	74
卢舍那佛会.....	74
大肚弥勒佛.....	75
白马驮经.....	76
唐僧取经.....	76
多闻天王.....	77
阿弥陀佛.....	78
地藏菩萨.....	80
十六罗汉.....	81
麻曷葛刺佛.....	82
三清尊神.....	83
吴汉月墓守门神.....	83
沧桑遗迹.....	84
杭州碑林.....	84
文澜阁.....	85

胡庆余堂.....	85
西泠山水情，淑人多才艺.....	87
白塔桥边卖地经.....	88
七星钉飞龙，只差一桶水.....	89
八卦田.....	90
水竹居.....	90
绉云峰.....	91
轶闻雅趣.....	92
月下老人.....	92
东坡轶事.....	93
西湖清官.....	94
韬光观海.....	95
喻皓建塔.....	96
才女断肠.....	96
臭秦桧.....	97
因“坠”得福.....	98
疯僧扫秦.....	98
蚁王报恩.....	98
小炒肉.....	99
康乾南巡.....	99
参考文献.....	101

# 序言

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人文荟萃之地，四方文化融汇之所；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便是在这些古都中映现出来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的古都，自然就成为人们洞窥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因而吸引着无数的游人纷至沓来，领略其风采。

中国古代都城，是在城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和语言文字中，最初的“城”和“市”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所谓“城”，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获取和维护政治、军事权力而建造起来的设施，而“市”乃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一般而言，“城”的出现比“市”早，“城市”一词的使用，是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市”逐渐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相互渗透结合的结果。史学家们一般把夏代中晚期至西周视为中国古代城市（确切地说是古代都城）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城市的行政地位不同，因而它们的等级也有区别：按行政级别可分为都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各级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有一定的规定，而且，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一般也取决于它们的行政级别。所有城市中，地位最高的是都城，因为它们是一国之都。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王朝更迭，列国递变，因而出现过许多都城。据《水经注》记载，在北魏以前，中国就有 180 多个都城，加上北魏以后到明清时的，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大约有 200 多个，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比肩的。在这些古都中，最著名的便是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它们号称中国六大古都，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第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六大古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和瑰宝，它们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和缩影。它们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并未随着古代政权的消亡而嘎然而止，而是以其旧有的文化和新的文化相融通，不断向前发展，丰富着新的中华文明，使千年古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对中国古都的研究方兴未艾。人们认识到，要想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首先就应该搞清中国古都的历史，特别是这六大古都的历史。同时，不清楚这些古都形成与演变的规律，也就不可能为这些已成为现代大城市的古都提出有价值的管理规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文化旅游系的数师、学者共同研讨、合作撰写了这套“华夏美·千年古都旅游文化书系”。

这套书系共有六本，每本由上、下篇构成。上篇主要是记述这些古部的历史沿革，下篇则以现存历史文化景点为依托，向您介绍这些古都的轶闻趣话和优美的故事传说，展现出古都丰富浓烈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情调。所以，这套书不仅是一部古都的历史，也是古都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同时亦是一本可资导游古都的书籍。

这套“华夏美·千年古都旅游文化书系”是在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耿小云总编和陈业新先生的策划下得以顺利完成的，他们多次与作者一道研究如何写好这套书，并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辛勤的工作，付出了许多心力。本书系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历史与旅游文

化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年富力强。为了写好这套书，大家多次在一起相互切磋，精诚团结，使这套书得以如期高质量地完稿。这套书虽然由雷学华先生和我共同主编，但主要贡献却是各位编著者做出的。

1997 年是中国旅游年，我们希望这套“华夏美·千年古都旅游文化书系”能为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使每一个炎黄子孙更加热爱我们的古都，热爱我们绚丽的祖国。

姚伟钧

1997 年 5 月 1 日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上篇 千年沧桑人间天堂

### 悠悠钱唐事

杭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

今天的杭州城区和西湖，远古时候是一个波涛汹涌的马蹄形浅海湾。现在西湖北边的宝石山和南边的吴山，就是环抱海湾的两个呷角。汹涌澎湃的潮汐日夜冲击，并带来大量泥沙；而在退潮时，由于水流较缓，又有宝石山、吴山这两个呷角在南北分头阻挡，泥沙便渐渐沉积下来，形成沙洲。这些沙洲，日积月累，不断向东、南、北三个方向伸展扩大，最后宝石山和吴山的沙洲汇合一起，把海湾和大海分隔开来，逐渐形成了今日西湖和杭州的地形。

杭州最早的人类活动发生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现在西湖北部的老和山麓，经过古荡、勾庄、水田畈，向西北延伸，直到余杭良渚、瓶窑、安溪等处，都发现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遗物，这就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时期。其中老和山遗址，是离杭州市区最近的一个原始居民聚落，距西湖仅一千五百米。考古工作者从中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石器、玉器、陶器的残片达二千多斤。水田畈遗址也出土了丰富的文物，有犁、铧、斧、刀等石器农具和水稻、芝麻等作物的种子。在遗址水沟里还发现四条长约二米左右的木桨，说明当时已广泛使用独木舟作水上交通工具。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很多木榔头、木盒和竹编的日常生活用具。所有这些，比较清楚地描绘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杭州原始居民在这一带居住生活的情况。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著名的良渚文化，而这些灿烂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文字记载以前的杭州历史提供了依据。

相传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杭州属于古扬州之域。古扬州泛指长江以南“江水波扬”的广大水乡。虽然今浙江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当时并未出现杭州一带的地名。春秋时期，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越国。战国时期，越国为楚所灭，浙江又被纳入楚国版图。杭州最早见于历史记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在今苏南、浙西、浙东、闽北等范围内设会稽郡，郡下有二十多个县，其中一个叫钱唐。钱唐县就是今杭州的前身。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出巡东南，在会稽山竖了一块大石碑，为自己歌功颂德，史称“会稽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他“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这就是“钱唐”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传说今宝石山下，还有秦始皇缆船石的遗迹。但是，秦始皇当年所到的钱唐县，其具体位置，从秦到晋，史书上都没有记载。一直到南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在钱唐县令刘道真所著《钱唐记》中，才有史以来

首次谈到钱唐县的具体位置。他写道：“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存。”

西汉时期，钱唐县仍属会稽郡，但地位却逐渐显要。汉武帝元狩年间（前 122-前 117 年），将会稽郡的西部都尉（负责郡级治安的军事机关）治所设在钱唐的武林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改制时，将钱唐改称“泉亭”。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又恢复钱唐旧名。东汉顺帝时，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钱塘江航运的兴起，会稽郡以钱塘江为界，一分为二。江北增设吴郡，治所在吴（今苏州）；江南仍属会稽。钱唐县从此划归吴郡。当时钱唐县的最大祸患是钱塘江怒潮，于是东汉末年修建了一条防海大塘。

据刘道真《钱唐记》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他还记录了一个有关防海大塘的传说。大意是：东汉末年，会稽郡官员华信提议修建堤塘以防海水。他们悬赏招募，如能运载一斛（十斗）土，给钱一千。结果，才十来天，就有大批运载土石的人聚集于此。但不久又传来不修堤塘的消息，人们只好弃石扫兴而归。结果，这些土石堆积起来，就成了一条海塘。由于筑塘的土石原本是要给钱的，于是这条海塘就取名“钱塘”。这个传说虽然很荒诞，但它却传递出一条重要信息，即钱唐县在东汉末年修建了海塘，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海塘的最早记载。海塘的兴建，对于防御潮患、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争，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南迁，给长江以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钱塘江流域的开发和航运业的发展，钱唐县逐渐成为钱塘江下游的重要城市。永明三年（485 年），南齐爆发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先攻下富阳，第二年兵临杭州凤凰山下，钱唐县令弃城出逃，农民军占领钱唐县。唐寓之以钱唐为中心，建吴国，改年号为“兴平”，立太子宫，置百官。后因农民军缺乏经验，起义最终失败。南朝萧梁政权（503-557 年）又将钱唐县升为临江郡。陈代（558-589 年）改临江郡为钱唐郡。从此，钱唐县就成为郡治所在地。

这样，自秦朝置县以来，经过八百年的漫长历史，钱唐终于从县升为郡治。

## 川泽沃衍商贾凑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杨坚平定南朝的陈，重新统一了国家。不久，隋文帝废除钱唐郡，建置杭州。从此，历史有了一个叫杭州的地名。

小资料：

关于杭州一名的由来，有几种说法。其一：相传公元前 21 世纪，夏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曾从这里舍杭登陆，“杭”是“方舟”的意思，故此地叫“禹杭”，发展到后来就叫“余杭”。其二：“杭”和“航”同音，“航舟”是“行船”的意思，后来就称“杭州”。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是说这里最早是一片汪洋大海。

杭州的州治开始设在余杭县，钱唐就成了杭州的属县。第二年州治从余杭迁回钱唐，县境得以扩大，原来的新城、盐官并入钱唐。开皇十一年（591 年），隋朝大臣杨素调动民工依凤凰山麓建筑州城，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城垣的兴建，对于杭州城市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今天的杭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隋朝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这主要表现为隋朝开凿了以杭州为南端终点的江南大运河。隋炀帝即位以后，为了营建东京洛阳，开始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大业元年（605 年），开凿通济渠，与淮水相通，并通过淮水连接今苏北的邗沟，直达长江。为了掠夺江南的财富，隋炀帝不仅疏浚和加宽了邗沟，还新开凿了一条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经苏州、嘉兴到杭州。当时，这条江南运河长达八百公里，宽十余丈，两岸遍植柳树，河中可通航巨大的龙舟，沿岸还设置驿馆，专为皇帝服务。从此，杭州和首都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这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杭州的发展和繁荣都发挥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据史书记载，隋代的杭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直至今日，从苏州、嘉兴到杭州的运河，在交通运输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 咽喉吴越，雄视江南

江南运河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杭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了唐朝，杭州又称余杭郡，始属江南东道，后隶浙江西道。郡治仍在钱唐县。因避国号讳，改“唐”为“塘”，从此，钱塘取代了钱唐。

唐时，杭州已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当时的杭州空前繁荣，每年的商税收入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杭州的丝织业、造船业在唐代发展很快。如唐代少府监把全国的绢布按质量好坏分为九等，杭州所产的苎名列第四。杭州所产的白编绫、绯绫，成为唐代贡品。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一诗中，有“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就是称赞杭州女工织造的有柿蒂花纹的丝绸。当时杭州民间已能制造三丈长的大船，船体规模和工艺水平，都与当时全国闻名的造船业中心苏州、扬州不相上下。

随着经济繁荣，杭州城区面积进一步扩大，人口也有了较快增长。唐代后期，杭州城区从原来的凤凰山麓柳浦即现在的江干一带，向北延伸到武林门。城南江边成为江海贸易的码头，城北武林门一带则因大运河的通航成为附近州县货物的集散地。隋时，杭州人口仅一万五千户，按一家五口计算，整个杭州才八万余人。到了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杭州人口已增至三万多户；至开元年间（713~714年），增加到八万六千余户。晚唐之时，杭州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

唐时，杭州的飞速发展和西湖的开发密切相关。那时，杭州靠近江海，经常受到钱塘江潮的冲击和侵蚀，地下水咸苦难饮，居民吃水成了严重问题，特别是杭州西北地区的居民。为了解决老百姓的淡水饮用问题，李泌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任杭州刺史时，修建了著名的“六井”。

小资料：

据载，六井是相国井、西井（俗称化成井）、方井（俗称四眼井）、白龟井、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和金牛井。所谓六井，其实是六处贮水池，用瓦管和竹筒分别从钱塘门、涌金门等处引入西湖湖水而修建。这种井与今天的井不同，它采用“开阴窰”的办法，即在地下挖渠道，再接水管，引湖水入方池。

方池约一丈见方，面积大，水量多。六井的修建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非常关键，它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促进了城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正如苏东坡所说：“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从此，西湖成为杭州城市的一部分，两者共存共荣。

六井的修建，大大改善了杭州居民的居住条件，杭州人口迅速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和街市的扩大，反过来增加了对淡水的需求，而六井本身却因西湖的淤淀和围垦水量日少。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杭州城市的发展。唐长庆二年（822年），著名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当时西湖已有葑田数十顷，必须疏浚，增加湖水。据白居易观察，泄西湖水灌溉沿湖农田，湖水每减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每泄水一昼夜，可溉田五十余顷。只要蓄泄及时，沿湖千顷农田就不担心干旱问题。于是，他就在钱塘门外石函桥附近，即今少年宫一带，修筑了一条湖堤，比原来的湖岸提高数尺，增加西湖蓄水。同时又疏浚了李泌修建的六井。

这样，杭州居民的供水又有了保证，为城市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白居易还植树栽荷，把杭州点缀成“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的迷人城市。

# 吴越国首府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由盛而衰。唐末，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黜唐朝皇帝，自立国号为“梁”，统治了黄河流域，史称“后梁”。此后，北方军阀混战，短短的五十多年间先后出现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小王朝。而在南方及山西等地的军阀乘机崛起，相继建立了十个割据小国。史称这段乱世为“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就是十国之一。其首府设在杭州，这是杭州历史上首次跻身于都城的行列，对杭州城市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钱镠崛起创雄藩

钱镠（852~932年），字具美，浙江临安县人。传说他临产之时，父亲到厨房取斧劈柴，见一条丈余长的怪蛇窜入室中。父亲大吃一惊，追进去，忽然怪蛇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霎时，钱镠呱呱坠地，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居都赶来救火。到他家中，又不见一点火光，都以为怪。父亲说是个妖怪，要将他投入井中淹死，亏得隔壁一个婆婆，再三挽留方才保住，遂将婴儿取名“钱婆留”。四五岁之时，家中院子里有一株大树，他与群童戏耍，走到大树之下，坐于石上，如同帝王一般，指挥这些孩子征战杀伐，他号令严明，孩子们都怕他。

长大之后，钱婆留相貌魁梧，体力过人，以贩盐为业。临安县有个录事叫钟起，有两个儿子与钱婆留相交，是在赌场认识的好朋友。尽管钟起不准儿子与钱婆留来往，但他们仍然来往不断。

一天，有个善辨风云气色、能知治乱穷通的豫章术士，望斗牛间有“王气”，斗牛就是钱塘分野，遂取路来到钱塘。到钱塘仔细一占，那“王气”却在临安地面，于是又来到临安。他假作相士，隐于市中，相来相去，都找不到异人的影子。钟起和这术士相好，术士悄悄对钟起说：“我占得贵县有个大异人，是未发迹的英雄。今相来相去，并无其人，不知隐于何处？你的相虽贵，却当不起‘大异人’三字。”钟起心生一计，次日大置酒筵，广招有名之士来家中饮酒，叫术士悄悄一一相过，又无其人。术士大以为怪，就宿于钟起之家。

一日占得“王气”正临钟氏之门，术士就暗中留心。恰在这时，钱婆留来找钟起的两个儿子，不料碰到钟起和术士正在庭院聊天。钱婆留看见钟起，转身就走。术士无意中看见他，不由得大吃一惊，说：“贵人原来在此！”钟起说：“先生莫要弄错了，这是我邻家钱婆留，无赖之人。”术士道：“正是此人，快叫来让我再看看。”等钟起将钱婆留追回见了术士，术士仔细相了，对钟起说：“我道你怎么有贵相，你儿子亦有贵相，原来全在此人身上。”又对钱婆留说：“你骨骼非常，贵不可言，愿自爱。”术士遂别钟起，说：“我特来访求异人，不是日后贪图什么名利，不过要显示我的术法罢了。”次日就回豫章去了。钟起自此之后，方才敬重钱婆留，任儿子与他来往，还时常贷其钱米。

唐僖宗乾符六年（880年），黄巢发动农民起义，钱婆留投入地主武装董昌部下，和黄巢的先头部队有过小冲突。不久，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董昌升为杭州刺史，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派钱镠做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年），董昌夺越州，把杭州遂交给钱镠。乾宁二年（895年），董昌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不服，灭董昌。从乾宁三年（896年）起，钱镠占据了两浙（浙东、浙西，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成为十国之一。他得两浙之后，请求唐廷将镇海军额由润州移至杭州，自兼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唐天复二年（902年），唐封钱镠为越王。

唐天祐元年（904年），钱镠请改封为吴越王，唐廷不许，改封吴王。及后梁建国（907年），钱镠称臣，后梁遂封之为吴越王。

钱镠和他的子孙有一项贯彻始终的政策，即向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称臣进贡。唐天祐以后，中原多事，四川王建称蜀，淮南杨行密称吴，南海刘氏称汉，福州王审知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钱镠的幕僚也劝他称帝自主，但钱镠却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踞我于上耶！”意思是：你们叫我称帝自主，这不是也叫我在炭炉上烤吗？他的策略是既割据东南，又不招致中原王朝的征伐。“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所以，后梁王朝建立后，他奉正朔，岁时进贡，尽藩臣之职。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这是他对中原王朝表示忠诚给他带来的好处。

吴越地域狭小，极盛时也不过只管辖十三州，以杭州为首府。杭州又名西府或西都，以越州为东府或东都。在吴越统治的七十多年中，杭州城获得了较快发展。在此之前，钱塘江两岸大部分属两个行政区，如东汉、六朝时，西北岸属吴郡，东南岸属会稽郡。西北岸的中心在吴即今苏州，唐代后期江南东道（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等）的治所也在苏州；而东南岸的中心在会稽即今绍兴。在这种格局中，杭州僻处浙西边隅，北面比不上苏州，南面赶不上绍兴，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经济发展也受到限制。杭州被定为吴越国都城后，一跃而成为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辛勤开拓，杭州逐渐成为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东南形胜第一州”。

## 知我罪我以此城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封建君主，钱镠在杭州的创业，为杭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杭州被定为国都之后，城垣建设和城市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大事，钱镠于开平四年（910年）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城垣建设工程。实际上，吴越国正式建立之前，钱镠已深感杭州城太狭，“点阅士马，不足回转。”曾两次加固与扩建抗州旧城，增强防御力量。

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九月，环绕包家山、秦望山扩建府城达五十余里。当时杭州城南群山相连，林木茂密，荒无人烟，筑城墙时还需“穿林架险”。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城墙于年底竣工。

第二次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钱镠亲率二十余万役夫，新筑罗城，四周达七十余里，东临钱塘江，南濒六和塔，西至雷峰塔，北及今艮山门外范浦，比现在的杭州城区还要大。城墙高三四丈，城周共开十个城门：“朝天门，在吴山下；龙山门，在六和塔西；竹车门，在望仙桥东南；新门，在炭桥东；南土门，在荐桥门外；北土门，在旧菜市场外；盐桥门，在盐桥西；西关门，在雷峰塔下；北关门，在夹城巷；宝德门，在艮山门外无星桥”。每一座城门的建造都十分坚实而美观。如朝天门，上面建有壮丽宏伟的城楼。城楼叠石基高达四仞又四尺，楼高六仞又四尺。城楼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减半。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四周壁立牙柱三十四。城楼之中还贮钟鼓以报时辰。城楼之西是武台，平敞可容士兵百余人，左右均可由石级盘曲而登。罗城要道有重兵把守，如城南上隅有“白壁营”；在钟公桥北有“宝剑营”；在盐桥东有“青字营”；在梅家桥东有“福州营”；在修文坊内有“马家营”；在诸家塘有“大路营”，防守非常严密。

当时，吴越的周边关系中，最大的敌国是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7年），盘踞在扬州的吴王杨行密企图吞并吴越。事先，杨行密和一个名叫祖肩的和尚一起前来侦察。经过观察，祖肩说：“杭州城，南北展，东西缩，形似腰鼓，要想将它攻下来十分困难”。他们目睹城内严整的军容，耳闻操练的鼓角声后，深有感慨地说：“钱氏防备甚严，其子孙当贵盛，未可图也。”杨行密遂打消了吞并吴越的念头。钱镠自己对杭州也沾沾自喜：“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钱镠第三次扩建杭州城是在杭州被定为国都之后。石梁开平四年（910年），他在凤凰

山东麓的唐朝州治与镇海军使院的基础上扩建“子城”。子城南有通越门，北有双门，富丽坚固。又把子城内的厅室改建为殿堂，当时主要有天宠堂、天册堂、阅武堂、都会堂、功臣堂、握发殿。

天册堂是举行国家大典、皇帝登基或接受中原朝廷册封等仪式的宫殿，象征钱氏为王受命于天，故称天册堂，类似于金銮殿，建筑极其豪华。

小资料：

天宠堂是钱王平时召见大臣商讨政事的地方。

功臣堂又名光册堂，内列大碑石，正面碑文记述钱氏的功德，背面罗列功臣五百余人，钱王常在此奖励功臣。

钱王还在八次大会文武臣僚商讨“平吴定越”的地方，建造八会亭，以作纪念，后改称都会堂。凡遇天灾人祸，钱王常在此举行祭祀，以求消灾。唐宝正元年（926年）六月，杭州大旱，且“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钱镠来此祈祷。据传，当夜大风即起，飞蝗纷纷落江而死。

阅武堂是钱王检阅军卒武艺，以示不忘武功之所。

握发殿是仿效周公握发求贤而取名，钱王常在此招贤纳士。

东宫，时称东院，是钱王、王子、后妃饮食起居的地方，内有丽春、瑶台、咸宁三院，院内有殿堂多处。丽春院是吴越诸王生活起居的地方。天福六年（941年）丽春院失火，宫宝、府库几乎被烧得精光。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城垣扩建工程，不但杭州城扩大了，而且城垣以内的街道、河渠、市场、房舍等，都相应得到了规划和修建。由于城市扩大、人口增加、生产发展、政事繁剧等种种原因，钱塘县显得过大。于是，原来的钱塘县，加上盐官县的一部分，划分为两个县，钱塘县的设置仍然存在，另外一个新增的县称为钱江县。罗城之内，也同样由钱塘、钱江二县分别管辖。到清朝末年，杭州城市内一直都有两个县的建置，只是钱江县名，由北宋初年起改为仁和县，从此不变。

## 钱王射潮筑石塘

吴越地处浙江与太湖流域，都城杭州在钱塘江之滨，举世闻名的浙江潮虽给人们增添了壮观奇景，但更多却是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早在秦汉时期，潮患的记载已见于史书。到唐末五代，钱塘江边因海潮袭击，自城南秦望山到今海宁约有十八堡的数十万亩良田，经常是“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唐末杭州刺史崔彦曾，在城区东南修筑过五里长的“沙河塘”，因规模较小，不能阻挡潮水的冲击，消除潮患。

吴越建都杭州，潮患成为直接影响吴越国的财政收入、城市安全和政局稳定的重大问题。天宝三年（910年），钱镠在扩建子城的同时，也开始修筑沿江沿海的堤塘。这年八月，钱镠动员民工在当时杭州受潮汐冲击最严重的候潮门至通江门外一带兴建一条长堤。他们先是在离岸二丈八尺的范围内打下木桩六层，每层中间又充实装有石头的竹笼与泥土，交错密排，堆成泥塘。泥塘之外，又植根柱十余行，以折水势；泥塘之内，再筑石塘，使之牢固。这条从六和塔至艮山门、长达一百多里的堤塘，由于民工的努力，只花了三个多月就完工了。后人称这条海塘为“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它使江边农田免受海潮侵蚀，再加之石塘具有蓄水作用，可以灌溉江边农田，杭州郊区农业发展迅速，“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钱镠修筑捍海石塘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及千秋万世的大功业，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钱王射潮”的传说。据《昭勋录》记载：怒潮急湍，海塘难成。乃采阳山之竹，选好箭三千支，钱镠亲率五百人，发箭射潮，倾刻间潮头退至西陵。余下弓箭埋在候潮门外。

这件事虽不免荒诞，但却看得出钱王敢于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钱镠使用竹笼、混柱

等技术设备建成的坚固捍海石塘，是我国古代建筑工程学的优秀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五代十国的君主，人们往往只记得他们的姓名，不大记得谥号、庙号，钱武肃王这个称号却因海塘而流传在口碑之上，比任何石碑、铁碑都要牢固得多。

## 兴水之利

除了修筑捍海石塘外，钱镠还对钱塘湖（今西湖）进行了治理。钱塘湖在唐朝时已成为饮水、灌溉两利的湖泊，对杭州越来越重要。西湖形成以后，不断沿着沼泽化的过程发展。李泌建六井时有过疏浚，白居易在杭州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 50 年，但湖中又出现了新田数十顷。这些都是湖泊沼泽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从白居易疏浚西湖，到吴越国建立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湖因年久失修，又被葑草蔓合，湖面缩小，蓄水减少，影响了灌溉和城市用水。于是，钱镠于宝正二年（927 年）又着手对西湖进行了疏浚。他建立了一千多人的专职浚湖队，称“撩湖兵”，不分昼夜从事疏浚工作。

另外，由于城市扩大，居民增加，单靠六井供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他又在城内挖水池三处，称涌金池，用与六井相同的方法引入湖水，以增加城市居民的淡水供应。

同时，钱镠还应交通运输需要而整治了钱塘江。为了减少江中的险滩以保证航行的安全，钱镠进行了凿平礁石、清除浅滩的工程，使钱塘江的航道有所改善，促进了吴越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通过钱塘江，吴越北通中原，南通闽粤，又由海路与国外通商，杭州市内商业繁荣，盛况空前，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商业都会之一。据载，当时的钱塘江上是“舟辑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号称一水之利。

吴越不但通过钱塘江由海路通青州，向中原朝廷纳贡贸易，而且它的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有东西两条航道。向西可远至大食（今阿拉伯），据说吴越的猛火油就“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向东可通往朝鲜、日本。钱镠曾遣使从海道到新罗、高丽、百济（今朝鲜半岛）。据说吴越末期有高丽海船到杭州，船主王大世有一件宝物，钱王出价黄金五百两，他还不卖。吴越和日本的贸易、文化交往频繁。

据日本《日本纪略》、《本朝文粹》、《扶桑略记》等典籍记载，吴越和日本自公元 909～959 年之间，双方商人、使臣、僧人来往多达十五次。如公元 919 年，中国商人鲍置求到日本，和日本官方贸易。公元 945 年，吴越商人蒋衮、俞仁秀、张文过等百人航海到日本肥前松浦郡柏岛。从吴越出口到日本的物品有丝织品、瓷器，日本向吴越出口的则有镏木、布、铜器。候潮门外的镏木桥就是用日本进口的镏木修造的。有个故事说，钱王妃孙氏，曾把一件宝物施舍给龙兴寺，这件宝物，形如朽木筷子，寺僧不识货，后来给一个波斯商人看见，他说这是日本的“龙蕊簪”，出价一万二千缗。由此可见，日本出口到吴越的东西，花样非常多。杭州就这样开始在国际上显露了头角。

## 有国百年，吾愿足矣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争频繁，吴越境内则比较安定。钱镠及其子孙除了筑捍海塘、兴修水利、劝课农商、招徕商旅，使吴越安定繁荣外，他们还为东南秀丽的湖山做了不少梳妆打扮的工作，大大美化了这个地区，特别是都城杭州。

谈到钱镠美化杭州的贡献，这里有一个故事。相传钱镠在凤凰山扩建子城造宫殿时，有个会看风水的术士对他说：“如果在凤凰山造宫殿，王气太露，不过有国百年而已；若将西湖填平，只留十三条水路以蓄泄湖水，建宫殿于其上，便有千年王气。”钱镠说：“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

吾愿足矣！”遂定基于凤凰山之上。

在千年江山与风景名胜西湖的取舍中，作为封建君主的钱镠竟然选择了西湖，他真是令千秋万代的后人对他骄傲。试想想，如果西湖被填平，杭州还能是杭州吗？正如一百多年后的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所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小资料：

由于吴越钱氏统治时期佛教盛行，杭州的大多数佛教艺术遗产，都是吴越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在钱氏当权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不仅扩建了唐代以前建造的二十多个旧寺庙，而且以各种名义新建寺院三百多个，比以前骤增了数十倍，杭州因此被称为“江南佛国”。

吴越国创建初期，钱镠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军事实力，巩固国防，扩大地盘上，但他仍然不忘修建佛寺，并先后建造了梵天院、登云寺等六个寺院。钱镠对名僧十分重视。据《西湖拾遗》记载，有一次，诗僧贯休写了一首题为《献钱尚父》的诗，要求谒见钱王。诗文如下：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满堂罗倚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翠华羞。于今得入凌烟阁，不愧当时万户侯。”

钱镠见诗大喜，只是脑袋发热，他嫌十四州地盘太小，大有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所以他就派门下吏对贯休说：“叫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但贯休傲然拒绝说：“州亦难添，诗也难改。我如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而必欲见也？”遂飘然而去。时人尽服其高，钱镠也无可奈何。

公元919年，吴越与吴举行无锡之战，双方讲和。从此，钱氏集团更重视利用佛教加强思想控制。到钱弘佐（942~947年在位）与钱弘俶（948-978年在位）统治时间，佛寺的兴建达到高潮，仅杭州一地每年少则增建一二所，多则五六所。据史书记载，当时杭州的寺院多达三百六十处。著名的佛寺如昭庆寺、净慈寺，都是始建于吴越，后经历代重修。

新建寺院的同时，又扩建与翻修旧寺院数以十计。保留至今的名寺——灵隐寺，得到扩建，第一次新建僧房五百间，第二次建僧房八百间；除了大雄宝殿、天王殿外，尚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寺僧多达三千余人，为灵隐寺的极盛时期。

吴越钱氏统治集团还到处建塔，仅杭州一地就有一百多个。一类是寺院经幢，为数很多，光灵隐寺就有四幢，保留至今；另一类是寺院高塔，著名的有四座宝塔，它们是西关外的“倚天醉翁”雷峰塔，月轮山上雄伟壮丽的“凌霄汉子”六和塔，宝石山上的“玲珑美女”保俶塔和闸口婀娜秀丽的白塔。四座塔风格各异，塔塔技艺精湛，为湖光山色增添了无限风光。

此外，钱氏集团还在杭州大兴开山造像，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石刻造像艺术作品。如慈云岭南坡石壁上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七尊造像和地藏菩萨像，烟霞洞正壁上的三世佛、胁侍像、十六罗汉及孔雀明王等，以及飞来峰青林洞内靠右摩崖上的弥陀、观音、大势至三尊佛像等。这些栩栩如生的造像，成为今天西湖宝贵的艺术珍品。

从这些寺、塔、石刻造像来看，吴越时期的杭州，显然要比唐代华美多了。正如《旧五代史》中所记，吴越时期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吴越的营建之功不可磨灭、永载史册。

##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经过吴越国七十多年的经营，杭州城市的发展终于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北宋时期，杭州尽管在政治地位上从一个小国国都退居到一个州的州治，但从城市规模来说，它仍然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北宋仁宗皇帝赞美杭州时说：“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北宋时期，杭州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人口增加。唐代，杭州户口最多的是开元年间（713-741年），八万多户。吴越时期，无文献记载。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杭州人口已达十万户。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继续增至二十多万户。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杭州人口已将近二十一万户，超过江宁、平江等地人口数量，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二是经济发展。中唐以来，杭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至道元年（995年），北宋在杭州设置“织务”，专门管理与收购本州及附近州县的丝织品。每年收购绢数为25万匹，占浙西诸州的三分之一强。《咸淳临安志》载，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是：纳绢95831匹，绸4486匹，綾5234匹，绵54000两。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宋徽宗曾命童贯置造作局于苏、杭，仅织绣工匠即达数千人，可知规模之大。

杭州还是北宋刻印书业的四大中心之首，印书的质量最高。刻印书业是北宋新兴的一个手工业部门，京城国子监是官府刻印书籍的中心，所刻印的书称“监本”。

小贴士：

据《两浙古刊本》统计，“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中国历史上发明活字版印刷的毕昇，就是北宋庆历年间杭州的一位雕版印刷工人。哲宗时，福建商人在杭州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发售，获利甚厚，后被知州苏东坡所禁。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镂板……禁私印及鬻之者。”

同刻印书业息息相关的造纸业也比较发达。据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记载，杭州“油拳”（即余杭县油拳村生产的藤纸），在北宋时享有盛名。此外，杭州的酿酒、造船、制扇等业都很发达。

杭州还是东南地区的一大商业中心，商业相当繁荣。以前，每年商税十二万左右，到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高达十七万多贯，成为全国商税缴纳最多的州城。词人柳永《望海潮》词上阙，用“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等句，形容北宋中期杭州的繁华。

三是交通运输发达。吴越时，钱塘江已是“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北宋时，杭州的对外贸易更加繁荣，丝织品等当地产品大量输出。端拱二年（989年）设杭州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杭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之一。后来有人用“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资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来描绘杭州港口的繁忙景象。与此同时，沿钱塘江岸，运河两边，还形成了南场、北关、安溪、西溪、范浦、江涨桥、汤村、临平等卫星镇市。

四是“山水之美名天下”。西湖在唐朝已成为饮水、灌溉两利的湖泊，越来越受重视。北宋历任知州，沿袭旧例，十分重视西湖水利的兴修。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的知州王济，他在吴越国以后又一次疏浚了西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堰闸设备，使湖水蓄泄有时，免于旱涝。宋仁宗时代的知州郑戡任官时，西湖由于葑草湮塞，而豪族僧侣又盗湖为田，湖面又一度大大缩小。郑戡动用上万民工，对西湖又一次作了规模较大的疏浚。比他稍晚的沈遘，为了满足城内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在美俗坊修建了一处水量特大的水井，解决了附近很大范围内的居民饮水问题，以后就称此井为沈公井。到了熙宁五年（1072年），六井与沈公井逐渐湮塞，知州陈襄又一次疏浚西湖，修理渠道，使各井蓄水又重归充沛。在疏浚开发西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西湖山青水秀，景物优美，是一处游赏胜地。

小贴士：

相传宋初潘阆撰《酒泉子》十首，追忆杭州西湖的山水胜景，一时盛传，苏东坡爱之，书之于玉堂屏风；石曼卿使画工绘之作图。天禧五年（1021年），杭州知州王随在《放生池记》中称赞西湖：“宝刹相望，缭岸百余寺，烟景可爱，澄波三十里，实二浙之佳，一方之上游也。”

此后，西湖山水的名气越来越大，专为西湖而作的题咏也越来越多。大文豪苏东坡更是与杭州湖山结下不解之缘，他一生曾两次被贬到杭州做官，特别是第二次到杭州做太守时，

他不仅对西湖进行了彻底的疏浚，而且还为西湖增加了六桥分列、桃柳呈妍的苏堤，不断为西湖锦上添花。当然，尽管他十分欣赏西湖的美景，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但他治理西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可是，从这时起，西湖不只是用于水利灌溉，也开始成为游览胜地了，所以史学家们有“西湖兴盛在白居易，完成于苏东坡”的评价。

正如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所说，北宋时期的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沓霭之间，可谓盛矣。”

## 赵氏偏安钱塘

### 权都吴会

金灭辽后，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开始，对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金军势如破竹，很快渡过黄河，包围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北宋君臣乱成一团。荒淫昏庸的宋徽宗急忙将帝位传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自己率宠臣逃往南方避难。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再次大肆南侵，摆开灭北宋之势。从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金主又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金军把徽钦二宗及宋朝的后妃、宗室，连同朝官共三千多人，一起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等，也被洗劫一空。这就是“靖康之难”。它标志着北宋王朝的灭亡。

靖康二年五月初，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宗泽等北宋旧臣的拥戴下，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1127~1130年），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

立国之初，由于金军步步紧逼，宋军节节败退，形势危急，应天府很难保住。仅仅五个月，又被迫南迁，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南逃途中，朝廷上下纷纷议论建都之事。建炎年间，高宗与群臣关于建都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激烈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议都是在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当时南宋政权在应天府立脚才一二月，争论的焦点是坚守中原还是巡幸（迁都）东南。这年七月，宋高宗在投降派汪伯颜、黄潜善的请求下，下诏“巡幸东南”。主战派李纲坚决反对，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是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为今之计，当暂幸襄（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邓（治所在今河南邓县），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

经过李纲这一分析，高宗暂时收回诏令，下令让文武廷臣进一步讨论。在讨论中，出现了三种意见：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京城；汪伯颜、黄潜善请幸东南。李纲在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军事形势后，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今南京）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这次讨论因宋高宗举棋不定而未有定论。但是，宋军军事上的迅速溃退，金军的长驱直入，却替当权者作了选择。次月，宋高宗急忙下手诏说：“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卫尉少卿卫肤敏上书，主张定都建康。他说：“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中书舍人刘珣则进一步阐述定都建康的有利条件：“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经过群臣商讨，认为巡幸东南，迁都建康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第二，东南久安，财力富胜，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于是，迁都建康就变成了定论，赵构在商丘仅仅呆了五个月，就弃城出走了。

建炎元年十月，宋高宗一行逃难到扬州。他原想喘一口气，从长计议迁都之事，但因迷恋扬州的生活，开始在扬州修建宫室。投降派越来越嚣张，不作抗金准备，却打算偷安岁月。可是军事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仅仅过了一年多，金军就跟踪追击，驰骋而来。建炎三年二月，金军兵临城下，距扬州仅数十里。高宗闻讯，逃至镇江。

第二次议都就发生在高宗逃到镇江之后。高宗预感镇江、建康等地濒临大江，离前线太近，不安全，于是他召集文武近臣再度商议下一步巡幸计划。由于高宗逃跑心切，他直接提出方案，供大家选择。他说：“姑留此，或径趋浙中邪？”他的意思就是直奔杭州，只是未明说而已。当时，吏部尚书吕颐浩请巡建康，“以为江北声援”，群臣附议；独王渊提出异议，请幸杭州。他说：“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此议未获多少人的支持，但因正合赵构心意，于是当即决定：当夜直趋杭州。

行至平江府（今苏州），当时已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卫肤敏，再次入对（臣子入朝见皇帝）。他坚持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可是高宗深恐大江阻挡不了金军，建康不保，去杭之志已定。于是卫肤敏转而附合：“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这样，迁杭之事就事实上定了下来。

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南宋君臣到了杭州，诏令改杭州治为行宫。赵构原打算偏安钱塘，不料三月初发生苗傅和刘正彦兵变，逼高宗逊位于皇子魏国公。一个月后，高宗才勉强复位，这个意外打击迫使他装出一副抗金姿态，移蹕建康。但是，战局对宋十分不利，宋军继续溃退，建康眼看不保。

在四面楚歌的危急形势下，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又召集随驾百官与诸统制共商巡幸之事。这就是第三次议都。高宗提出，“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蹕；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张浚提出迁都武昌，马扩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建康。这两种意见都遭到反对，认为东南是今日根本。御史中丞张守说：“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建都金陵，因江、淮、蜀、汉之资以图恢复。”迫于“建都金陵”的呼声有相当影响，高宗只好决定暂留建康。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建康危若累卵。赵构心神不宁，百官群臣中希望权都杭州的人也越来越多。尚书考功员外郎楼炤提出：“权都建康，渐图恢复……权都吴会，以养国力。”此言正中高宗下怀，于是高宗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蹕迁都。

可是，金兵铁蹄穷追不舍，高宗只得一路逃难，历经建康、杭州、越州、明州，最后无奈，把小朝廷装进船内，经定海（今镇海）逃往台州、温州。金兵下海追了三百里，幸遇台风暴雨，被迫而返。这样，南宋政权于建炎四年四月，方北返越州，作为行都。次年改号为“绍兴”。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以示“绍继中兴”。

驻蹕绍兴后，一则物资耗量倍增，供不应求，同时“江湖寇盗多，贡赋不继”，给南宋朝廷的财政开支带来很大困难；二则久驻会稽，偏于一隅，不利于高宗打出抗金和收复故土的旗帜，因此南宋朝廷于绍兴元年十一月以“港运不继”为理由，决定“移蹕临安”。

绍兴二年，高宗搬回临安。从绍兴二年至六年，抗金形势好转，高宗在大臣的促动下，进蹕建康。绍兴七年，宋金出现对峙局面。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绍兴八年，高宗不顾群臣反对，从建康返回临安，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定都临安。

小资料：

南宋时期，虽定都杭州已属既成事实，但移都建康之议仍绵延不绝。如陆游在《上二府论都邑札子》中大声呼吁：“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高宗也不得做做样子，

屡次短期移蹕建康，并定建康为“行都”，作为陪都。孝宗即位也曾下诏经营建康，以图进取，但始终未能改变定都杭州的事实。主要原因有几个：一是杭州比建康远离前线，比较安全；二是杭州离建康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区别。杭州在北宋时就已成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因此，南宋最终以临安府为“行在所”，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及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条件共同决定的。

杭州就这样跃升为一个朝代的首都，尽管已丧失了半壁江山，但持续时间却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它不仅是“东南第一州”，而且是全国第一大都会，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算是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杭州也因此跻身我国大古都的行列。

## “仅蔽风雨足矣。”

南宋初年，由于中原动乱和朝廷南迁，大批官民蜂拥南下。“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南渡的大量人口，大多流寓在浙江，而京城临安则是外来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杭州的居民为203570户，经建炎十三年金军三个月的烧杀抢掠，杭州居民大减，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4年），杭州居民重新增加到261690余户，计55万余人，到南宋末叶，临安人口已达391259户，计124万余人。人口增加，城市迅速发展，自北宋末到南宋初的数十年的时间里，杭州从一个州治跃升为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

南宋临安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就是皇城，以凤凰山东麓的州治拓建而成。皇城地点的选择，初有两种方案：一是选择风景幽雅的西溪、留下一带，新建皇宫，以求和北宋皇宫在汴京西北相符；二是主张以凤凰山东麓的州治为基础，拓建行宫。宋高宗经过比较，又考虑到南宋初年的军事失利、政局不稳、财力不足的形势，最后采纳了后一提案。

地点确定之后，宋高宗于绍兴元年十一月派内侍杨公弼和权知临安府徐康国共同筹划建宫事宜。高宗一再叮嘱杨公弼“止令草创，仅蔽风雨足矣。”务要精省，不得华饰”。几经筹划，杨公弼提出添建三百间，而徐康国依据临安的物力，主张增建二百间。高宗肯定了徐康国的意见。绍兴二年七月，开始改建州治大门为皇宫正门，上面新建楼屋一所，至九月完工，上悬匾额“行宫正门”。绍兴三年底，又把底小短薄的宫墙加高增厚，加强防御能力，下令禁止攀越宫殿墙垣，并制定门禁的具体条文。白天进出要凭特制的“门符”，夜间闭门后，不得随便出入。如果“门符”不合而开门者，要流放二千里；如擅自开门，则惩以绞刑。

绍兴初年的行宫，非常“简省”。当时“行宫外朝止一殿；日见群臣、省政事则谓之后殿；食后引公事则谓之内殿；双日讲读于斯，则谓之讲读”。宫内道路及百官朝见前所站立的廊庑均未铺建。一遇雨天，“百官趋朝，冒雨泥行”。绍兴八年，正式定都杭州后，宫殿建筑日趋加速，经过二十年的建造，皇宫初具规模。孝宗之后，又历经诸帝百余年的修葺、添造，皇宫规模和汴京禁内相仿。

皇宫大致范围是：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方圆九里。皇城的南门叫丽正门，是皇城的正门，建筑与装饰十分华丽，“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大门之前是左右列阙和百官侍班阁子。门外两侧排列两行红漆杈子，禁人超越。再前，是方圆三四里的广场，限制行人通过。大门之上建有重檐庑殿顶式的城楼，楼中有钟鼓。凡是皇帝出入，必须鸣钟击鼓。凡遇三年一次的大赦，皇帝就登上丽正门城楼，举行“肆赦”的典礼仪式。北门叫和宁门，也有三门，华丽程度与南门相同。东有东华门，在和宁门之东，西有西华门，在和宁门之西。皇城内殿宇亭阁，星罗棋布。据明代《钱塘县志·纪都》统计，皇城内有大殿三十，堂三十三，阁十三，斋四，楼七，台六，亭十九。

皇城内的宫殿布局，基本承袭了《周礼》“前朝后寝”的传统格式。